

人工智能文学主体性问题反思

吴珊珊

【摘 要】人工智能文学是人与人工智能交互共创的新型文学形态。面对富有竞争力的智能主体，对“何谓文学性”“何谓创造力”等问题的焦虑与探究，体现了人类在文学维度上对自身主体性的反思。在与智能主体的竞争与合作中，人类的行动策略已从“抵抗非我的他者”逐步转向“抵抗自我的消亡”，这一转变不仅体现了人类对自身价值的重新审视，而且在实质上推动了主体性的重构与重建。从主体间性的理论视角看，人工智能文学可被称为“我们的文学”，它重构了“自动化”与“陌生化”之间的关系，为传统文学性提供了新的感知方式。在公共性的审美活动中，人工智能文学运用个体经验对集体知识进行创造性改写，促进了对不同主体共同景况的有效表达，为应对主体性问题提供了文学维度的解决方案。

【关键词】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文学 主体性 主体间性

【作者简介】吴珊珊，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 I0 - 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 - 1125 (2025) 04 - 0159 - 18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飞跃式发展和语言模型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在文学、绘画和音乐等领域展现了令人瞩目的创作能力。2023年10月，《机忆之地》在第五届江苏省青年科普科幻作品大赛中获得二等奖，担任评委的多位专家均未能发现这部作品为清华大学沈阳教授团队采用AI技术创作的小说。这一事件不仅表明AI作品能够在人类文学竞赛中“以假乱真”，而且标志着曾在与人类的合作关系中充当“辅助工具”的AI，如今已能以作者身份参赛并赢得荣誉。

作为文学领域中“堪比人类的新参与者”,^① AI 在后人类主义文化景观中引发了一系列极具冲击力和颠覆性的效应,使创作主体的重要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凸显。如果说 J. 希利斯·米勒(J. Hillis Miller)提出的“文学终结论”^②旨在讨论文学在媒介泛化浪潮中逐渐式微的缘由,彼时文学遭受的冲击尚且主要源自外部环境对创作主体的影响,那么 AI 文学引发的震荡效应则更具颠覆性的态势发生在创作主体内部,其潜在的言说对象与挑战目标皆直接指向人类创作主体。这不仅引发了关于“何谓文学性”与“何谓创造力”的讨论,而且促使我们深入思考“何谓文学本质”“未来的文学向何处去”等根本性问题。这些问题终究要回到文学文本的实际生成过程,从中寻求答案。要厘清 AI 文学创作中的主体性问题,就必须回答以下两个关键问题:在文学创作活动中,人类主体与智能主体之间的分工模式是什么样的?在传统的主体概念逐渐失效的背景下,新的主体将如何在人机之间的张力中形成?

一、AI 文学引发的焦虑:主体性反思的文学维度

(一) AI 文学兴起背景下的主体性焦虑

机器参与文学创作的历史可追溯至 1962 年问世的美国写作软件 Auto-beatnik,这一能够自动生成诗歌的写作机器的出现,堪称在文学场域中非人的存在“入侵”人类创作特权的早期案例。1998 年问世的 Brutus 能在 15 秒内生成一部较为成熟的短篇小说,当它和人类的作品被混在一起发表后,许多读者难以辨别其中哪些作品出自人类之手。在机器写作由文学构想转为文学实践的早期阶段,清华大学的“九歌”、微软亚洲研究院的“电脑对联”和 IBM 中国研究院的“偶得”等写作软件,为机器参与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的契机。这些软件尽管已经解决了 Auto-beatnik 面临的诸多技术难题,但是仍然无法克服由分词化创作机制导致的偶然性与不稳定性,其生成的作品常有意象孤立、逻辑断裂和意义缺失等问题,堪称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式文学机器概念在新技术条件下的进化与回归。^③ 彼时 AI 尚未真正获得文学创作的

① 王小英:《人工智能不是文学的敌人》,《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2024 年第 4 期,第 17 页。

② 参见[美]希利斯·米勒:《文学死了吗》,秦立彦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7 页。

③ 参见[英]乔纳森·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刘春芳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80 页。

“入场券”，其在文学创作中主要扮演人类的助手，被视为这场文学实验的研究对象。虽然“人类在人工智能面前至少目前还可以自信地保持尊严”，^①但是AI的自主性和对人类构成的威胁已经在人机交互模式中隐现，冲击着“原本坚固的人/自然/机器之间的想象区隔”，^②传统作者身份的边界随之逐渐模糊，人类这一昔日文学堡垒中的主导者面临沦为“过客”的潜在危机。在这一阶段，针对AI文学的批评话语，主要以否定机器在文学和艺术领域的创造力为主流，评论家往往从“情感”和“意识”等人类生命形态特有的机制出发，充分肯定人在文学创作中的独尊地位，坚守艺术这一“人的创造力的最后领地”，^③这种立场恰恰反映出评论家在面对新挑战者时的隐忧。

在普遍认知中，依靠“灵感”进行创作被视为文学创作者最具创造力和独特性的表达方式。“灵性”、“文心”和“神思”等概念，常被视作人类在艺术领域中独有的话语实践方式。然而，随着“电子义肢”逐渐演化为智能主体，“灵感”、“意识”与“创造力”等源自创作主体自身的要素，成为AI重塑文学观念的突破口。例如，小冰框架迭代旨在为用户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其中一个重要的功能是利用深度神经网络对用户上传的图片信息进行解析，继而通过“触图生情”的模式实现高度自动化的写作。就人类作家的创作心理而言，“触景生情”是一种难以用科学方法进行测算和展现的思维过程，通常指作家在面对特定景物时“情随景生”的创作冲动与“辞以情发”的创作行为，作者对世界的体察与感知贯穿创作过程始终。然而，小冰并非直接从外部世界获得经验，而是在对蕴含信息的图像内容进行解析的同时，将通过深度学习获得的“二手经验”置于非意向性的运算框架。因此，小冰有可能在对一张桥的图像进行凝视时联想到曾经学习过的经典诗歌意象“康桥”，并基于“康桥”找到“爱情”“梦”“三月”“蕙风”等与之匹配的意象，^④最终围绕抒情主题生成文本。

在小冰的创作中，“情感”和“意识”被排除在外，成为无关项和“冗余物”。^⑤AI的文学实践由此塑造出一种去情感化、非意向性的全新文学形

① 文贵良：《从小冰到 ChatGPT：对人工智能与汉语诗学的一个考察》，《南方文坛》2023 年第 3 期，第 20 页。

② 张春梅、姜琴：《讲述是一种仪式：关于未来想象的“后设之维”》，《南方文坛》2024 年第 5 期，第 119 页。

③ 王峰：《智能时代的美学潜能》，《社会科学战线》2024 年第 5 期，第 181 页。

④ 参见小冰：《阳光失了玻璃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7 年版，第 15 页。

⑤ 参见王峰：《智能时代的美学潜能》，《社会科学战线》2024 年第 5 期，第 184 页。

态。一方面,这表明智能主体具备思考与创造的能力,它不仅能够“总结归纳并运用文学传统和文学惯例”,^①而且在某些方面甚至能超越人类,其作品在生成机制上属于“算法文本”,从创作水准上看则不宜用“仿诗”“类文学文本”等含有贬抑色彩的术语加以评价。另一方面,智能主体的文学创作实践也揭示了一个事实:语言并非思考的产物,而是伴随思考不断“涌现”的事物。思考本身是一种可以实践的功能,文学创作活动无须以有情感的创作主体为前提。“灵魂”和“意识”这两个被移用的概念则应回归艾伦·麦席森·图灵(Alan Mathison Turing)的本意,它们不仅从来与人工智能无关,而且不具有对文学主体的本质性规定。^②因此,作为自然主体的人类被置于与智能主体共享书写权利的现实境遇,问题的核心逐渐从“焦虑的主体”转向“主体的焦虑”。人类在文化空间中的主导地位逐渐丧失,创作特权也随之消解,揭示出主体性危机的文学之维。由此,“作者之死”不再主要体现为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笔下主体在观照他者过程中发生的分裂(split)与消亡(fading),^③而是伴随每一次人机交互行为的发生,表现为人类在面对具备强大学习能力和发展潜力的竞争者时的紧迫、失落和焦虑。这些复杂的情绪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在“向未来”的文化图景中,当主体概念的边界受到AI冲击时人类最为真切的生命体验。

(二) 从焦虑到抵抗: AI文学发展初期的主体性危机应对策略

思想中的焦虑往往导致行为上的抵抗。人对智能主体的恐惧会导致“人类对自身能力增强的渴望”,“哪怕中间存在某种短暂的能力不对等阶段,人类也必然向增强功能的方向前进,更何况其中还包含巨大的正面回馈”。^④随着ChatGPT的横空出世,AI正在以其革命性的力量重塑人机交互模式与人机协同的文学创作范式。这一技术革新不仅提升了文本生产效率,而且降低了文学创作门槛。于是,在文学活动中人机之间的分工模式与主次关系发生了变革,被笼罩在交互状态下的人本身也面临着前

① 成业、殷国明:《人工智能诗歌写作的读者认知与“重写”——由“小冰”诗歌中的风景引发的思考》,《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第33页。

② 参见王峰:《人工智能需要“灵魂”吗——由大语言模型引发的可能性及质疑》,《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2期,第7页。

③ 参见 Jacques Lacan, *The Four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Psycho-analysis*, London: The Hogarth Press Ltd., 1977, pp. 131, 208。

④ 王峰:《人工智能需要“灵魂”吗——由大语言模型引发的可能性及质疑》,《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2期,第10页。

所未有的矛盾：一方面，作为自然主体的人类欣然接受智能主体提供的辅助与便利；另一方面，主体性焦虑从理论层面转向实践层面。以网络作家面对 AI 文学时的复杂心态为例，网络作家群体对 ChatGPT 和小冰框架等 AI 的态度既不是“接纳—使用”，也不是“拒斥—抵制”，而是在这两种极端情形之间艰难地寻找可行路径。对许多专职网络作家而言，题材的同质化和内容的程式化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作品的原创性，从长远看不利于行业的健康发展，但对某个爆火创作题材的跟风与模仿，实则是作者主动适应市场需求的策略性调整。这一现象不仅体现了大多数以卖文为生的网络作家对读者口味的积极迎合，而且反映了他们对网络文学作品的商品属性的清醒认知。然而，对相似的故事类型、人物设定和叙事结构的竞相模仿反而使“匠心”的重要性得以凸显：在同质化对创新性的压抑和商业化对文学性的侵蚀之间，看似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但在网络作家们大浪淘沙般的竞争与迭代中，二者竟然形成了良性循环与动态平衡。在程式化的文本生产模式中寻求原创性，是提升核心竞争力的良方，这一策略在激烈的行业竞争中成为网络作家群体的普遍共识。然而，随着 AI 在网络文学创作中的广泛应用与深度参与，这一共识正遭遇前所未有的冲击，甚至几近瓦解。

AI 惊人的学习能力和创作效率在推动网络文学创作提质增效的同时，也破坏了原本相对公平的网络文学行业生态，引发了网络作家群体的普遍焦虑与恐慌，进而促使这一群体形成了一种事实上难以长期维持的以“共同抵抗”为基本特征的行业契约。对网络作家而言，智能主体的加入使“劣币驱逐良币”的风险持续攀升，人类作者比从前更有可能成为行业中的被淘汰者。在一些倡导“更新量为王”的网络文学平台，许多网络作家将拟定大纲和创作初稿的任务完全交由 AI 助手完成，自身则专注于初稿的修改和润色。^① 这种做法在缩短创作周期的同时，也极大地提高了作品的更新频率，从而增加了作品的曝光度，为网络作家带来了更多经济收益。尽管其中的许多作品有明显的智能主体参与创作的痕迹，但是并不妨碍它们在商业领域取得成功。在 AI 技术发展尚不成熟时，在“碧水江汀”与“龙的天空”等网络文学作家聚集的专属平台上，抵制 AI 辅助创作的声音一度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尽管持相反意见者自认为是“得利者”，却很少公开参与论战。

① 参见无戒、杜培培、俞庚言：《硅基物语·AI 写作高手：从零开始用 ChatGPT 学会写作》，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3 年版，第 163 页。

身为“少数派”的他们在对“多数派”怀有“歉意”的同时,^①继续默默开展与 AI 的合作。

然而,随着 AI 和大语言模型的不断迭代,一幅令“少数派”与“多数派”同时感到惊愕的图景在网络作家群体眼前徐徐展开:AI 文学的自我规定在实现拟人化后转向经典化。时至今日,对人类“灵感”的坚守不断被“复制”带来的利益动摇,任何人或许都难以避免自己的作品被收入供 AI 学习与模仿的数据库,成为 AI 文学技术迭代中的铺路者。谁也不能保证,自己不会在未来的行业竞争中黯然出局。当人类作家在 ChatGPT 助力下赢得“芥川龙之介奖”之后,智能主体创作的经典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值得注意的是,ChatGPT4.0 已成为众多网络作家和文学爱好者在创作中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发布的《2023 年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研究报告》,2023 年我国网络文学 IP 市场规模同比增长近百亿元,^②这背后的关键驱动力之一正是 AI 技术。当前,智能主体“辅助网文作者提升创作效率已成行业共识”。^③愈加高效、优质的人机合作模式,既为那些不愿向新创作方式妥协的网络作家奏响了“理想主义者”^④的悲歌,也促使更多人在压抑与焦虑、迷茫与新奇中接受无法逃避的现实,^⑤并向 AI 伸出合作之手,与其共享“文学堡垒”中的书写权利。在 AI 技术推动文学生产从 PGC (professionally generated content, 专业生产内容) 向 UGC (user generated content, 用户生产内容) 的转变过程中,昔日形成“共同抵抗”默契的“多数派”正加速分化,其中那些不愿改变的群体已成为新的“少数派”。

对当今的网络作家群体而言,最深刻的危机或许在于“劣币”与“良币”的内涵在未来某一天有可能发生变化,而他们的竞争对手也在不知不觉中悄然更替——从端坐在电脑后的人类同行转变为承担主要文本生成任务的 AI。对 AI 的广大用户来说,写作软件自动生成文本的机制俨

① 参见李诗雨、孙越阳、张雷:《抗争抑或妥协:加速社会视角下网络文学创作者对生成式 AI 的态度与选择》,《数字出版研究》2024 年第 2 期,第 107 页。

②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研究报告》课题组:《2023 年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研究报告》,http://literature.cass.cn/xjdt/202402/t20240227_5735047.shtml,2024 年 10 月 28 日。

③ 许旸:《一键出海! AI 助力网文 IP 生态提速》,《文汇报》2024 年 2 月 27 日。

④ 李诗雨、孙越阳、张雷:《抗争抑或妥协:加速社会视角下网络文学创作者对生成式 AI 的态度与选择》,《数字出版研究》2024 年第 2 期,第 108 页。

⑤ 参见翟尤、郭晓静、曾宣玮:《AIGC 未来已来:迈向通用人工智能时代》,人民邮电出版社 2023 年版,第 77 页。

然成为一个难以窥探的“黑箱”，其运算机制藏在庞杂的数据与复杂的算法背后。愈加便捷的交互框架使技术日益渗入生活的日常，而其背后的运行机理仍不为人知。正如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所言，机器复制的时代也是“灵光消逝的年代”。^①既然“焦虑的我”不再是文学活动中唯一具备“灵感”的书写者，文学创作的场域也早已向智能主体敞开，那么人类作者必须面对的问题就是，应当采取何种策略与既是助手又是竞争者的机器于文学殿堂之中共处。换言之，在人类主体性概念遭遇冲击之时，人类作者应如何通过文学活动在艺术世界中追寻隐现的“灵光”？

二、人机共创的 AI 文学：主体性重建的文学维度

（一）AI 文学的主体性疑难：一元或二元？

对主体性的阐释，历来呈现多元化的理论视角。一般而言，主体性这一概念主要指个体意识、感受和经验的自我表达与自我认知，它不仅涵盖主体对自身存在的认知维度，而且包括其对外部世界的感知层面，涉及个体在特定社会和文化背景下的自我认同建构。自笛卡儿哲学体系确立以来，人类作为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主体被认为拥有理性的自觉。达·芬奇笔下健美、和谐的维特鲁威人（Vitruvian Man）在主体性思潮的建构过程中，成长为在道德判断和行为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主体，并在对“客体”的认识和改造中不断完善自身。这个居于中心位置的人，同时也是文学创作领域的唯一主体。然而，如果将主体性界定为具备主动处理信息、做出决策、执行任务及适应环境等能力特质，那么 AI 作为具有类人智能特征、能够独立执行任务和适应环境变化的存在，其智能表现形式就已经具备决策能力和自我调适机制，足以被视为一种新型的主体性表现形式，即与人类主体相对应的智能主体。

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观点认为，人类主体与智能主体之间的关系呈现一种“此消彼长”的态势，这种关系在某种程度上难以调和，正如亚里士多德指出的，假如“无生命工具”都能按照人的命令自动工作，那么从事劳动生产的人口就不可避免地面临过剩的困境。^②因此，必须维护人类主体的

① 参见〔德〕本雅明：《迎向灵光消逝的年代：本雅明论艺术》，许绮玲、林志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② 参见〔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第 12 页。

独尊地位，以确保各行各业的人类劳动者不被机器取代。就文学领域而言，人类中心主义认为，文学创作过程充满“情感”、“直觉”和“意识”，这是人类无法被机器取代的核心能力的体现。然而，AI文学是一场“无灵感与直觉和无感情与思想”的语言游戏。其生成的“类文学文本”是不具备“原真性”的“规则产品”，文本呈现的“文学性”不过是“以其传播之美营造了算法文学的文学性假象”，^①在本质上是一场艺术的幻象。在坚定的人类中心主义立场中，“蕴藏着关于人类主体性的某种自尊心理”。^②尽管“这样的判断很可能犯了故步自封的错误”，^③但是对以人为中心的主体性概念的坚守，仍然不失为人类在AI时代为文学活动重新确证疆域的尝试与努力。然而，最致命的问题在于，人类中心主义的文学主体观无法否认在“非文学文本”中也存在“文学性”，这种观点的持有者只能向文学之外寻求对主体性疑问的解答。然而，如果仅仅为了将AI从文学活动中排除而将算法文本的审美价值归结为媒介塑造的“幻象”，就将导致文学创作与文学产品传播之间的无差别混同。这不仅使文学问题被置换为传播学问题，而且取消了人在与机器共舞的文学活动中对自身情感、意图和才智的文学性表达。尽管人机交互模式下的文学创作呈现跨学科特征，但是文学活动自有其特性，终究要回到文学本身的问题域中进行讨论。人类中心主义主体观对AI文学问题的传媒化应对策略，表明了其对AI“入侵”主体概念现象的焦虑与抵抗。然而，此种应对方式仍在二元对立结构中思考人与技术之间的关系，人类自身的身心问题无从解决，^④因此招致反人类中心主义主体观的批判。

反人类中心主义主体观可追溯至尼采对启蒙时代理性主义的深刻批判，以及他对多元、流动的主体观的系统建构。其后，福柯和德里达分别从知识与权力、语言与文本结构等维度对传统主体观进行重审和解构，他们的理论致力于消解人类中心主义权力话语，为后人类主义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后人类主义诞生于20世纪中叶，在系统论与信息论的影响下，技术对人身介入构成了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N. 凯瑟琳·海勒（N. Katherine

① 参见王万程：《算法文学的本质、文学性及审美属性辨析》，《南方文坛》2023年第5期，第134、138页。

② 杨宁：《人工智能写作与文学创作主体性问题反思》，《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2期，第27页。

③ 王峰：《仿若如此的美感：人工智能的美感问题》，《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第64页。

④ 参见柳海涛：《人类意识与人工智能》，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71页。

Hayles) 和凯瑞·沃尔夫 (Cary Wolfe) 等重建主体观的核心文化语境。他们批判传统人类中心主义对机器、动物和女性等“结构性他者”的压制与贬低,致力于构建一种消除具身化区隔的技术乌托邦,解构自我与他者之间的二元对立关系,从而突破“人文主义对何之谓人概念的限制”,^①消解本体论的自命不凡。后人类主义主体观的核心诉求在于构建一种充满异质性的、动态开放且基于“普遍生命力”^②的一元化生命基本单元,以此包容所有曾被传统主体概念排斥在外的“身份的破裂”者。^③文学与科学的协同作用能够加速对传统主体概念的解构,帮助人类与机器在共同探索中实现对主体性边界的重构,从而抵达“更真切的自我”。由此可见,后人类主义者期待和召唤的文学创作主体是真正意义上的“赛博格作者”。从多元化的生命形态看,包括人类、机器和半人半机在内的所有从事文学创作的个体,都可以成为后人类意义上的新作者,心智之于大脑如同程序之于机器。^④自然和文化两类元素将在赛博格主体的文学活动中实现和谐统一,普遍意义上的动物、植物、机器乃至环境都将被调动起来,曾经为人类主体特有的创作权将得到真正的共享。

从表面上看,后人类主义观点似乎能在“一元化主体”的范畴内消解人与机器之间的对立。实际上,这种观点并不能确保那个带有一些空想色彩的“美丽新世界”一定会实现。而生命的碳基形态与硅基形态能否在科技的作用下主动“黏合”为健康、和谐的生命体?人类难道只能如“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那般,制造出一个悲剧性的“怪物”(monster),一个游荡在人类社会的情感、法律与道德伦理边缘的“恶灵”(fiend)吗?这些问题同样难有定论。从人与AI的关系看,后人类主义的方案看似理想,以“一元和谐”的赛博格调调和了二者在“二元对立”中的紧张对峙。既然人在某种程度上已化身为技术本身,原来的对手也就不复存在了,主体性焦虑转变为一个“伪命题”。然而,潜藏于“无差别主体”表象之下的,是人与机器、动物之间无法彻底消弭的异质性。如果一味对其进行压制和遮蔽,就必然导致文学创作中多元主体的真实处境和诉求被篡改、被悬置。就文学

① [意] 罗西·布拉伊多蒂:《后人类》,宋根成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1页。

② [意] 罗西·布拉伊多蒂:《后人类》,宋根成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08页。

③ 参见[美] 唐娜·哈拉维:《类人猿、赛博格和女人——自然的重塑》,陈静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34页。

④ 参见[英] 安迪·克拉克:《心体:认知科学与人工智能的哲学挑战》,丁晓军等译,中信出版社2024年版,第321页。

自身而言,正如伊格尔顿指出的,后人类主义同样患有一系列西方“后学”的通病,其对文学话语中价值、言语与形象的认知始终受到政治诉求的裹挟。^①它将“文学”置于更加广义的“文化”概念之下进行讨论,将文学创作视为“赛博格作者”争取权益的重要途径,即一种事关生存的写作,^②却并未对“赛博格作者”的条件与素质做出明确规定,这就容易导致对作者身份边界不加限制地敞开和文学创作活动的失真,甚至将猴子在极小概率的随机事件中拼写出诗句等非文学行为也纳入其中。^③概言之,技术乌托邦路径对艺术本质的忽视,极有可能导致文学自身特性的消散。在后人类主义对“主体性”的重构中,潜藏着在文学领域中取消“文学性”的重大危机。

人类中心主义与后人类主义的文学主体观在理论诉求与价值取向上虽存在显著差异,却具有相似的问题域,并且都蕴含对AI成为真正主体之潜在素质的审视与评判。从思想范式的维度考察二者,无论是借助工具性话语强化人类对机器的控制,还是通过本质上无差别的生命存在方式消弭人与机器的界限,皆是在“人-机器”二元结构的框架内讨论AI时代文学的未来走向。尽管这两种学说的焦点分别指向基于不同意图且通往不同目标的抵抗路径,但是都以恢复与重建主体性为旨归,也都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卡鲁姆·蔡斯(Calum Chace)预言,AI技术高度发展后的人类社会将转变为“进托邦”(protopia),人类注定在这种新型社会形态中面临被进一步异化的风险:“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在这个崭新的世界如鱼得水。多数国家都有约10%的人产生深深的挫败感和失落感,他们要么在毒品中堕落,要么沉溺在VR里逃避现实。”^④高楼大厦下的破败贫民窟,霓虹灯照映下的泥泞、垃圾和雨水,无处不在的脑机接口,司空见惯的混乱与暴力,这些元素共同刻画出科幻电影和电子游戏中“赛博时代”的典型视觉意象。其中,技术与人类的界限日益模糊,人类在技术的不断进步中逐渐失去对自身的掌控。生存资源乃至人类自身似乎都难以摆脱被机器“挤占”的命运,正如小冰在诗

① 参见[英]伊格尔顿:《理论之后》,商正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47页。

② 参见[美]唐娜·哈拉维:《类人猿、赛博格和女人——自然的重塑》,陈静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71页。

③ 参见王雅静整理:《李星:从ChatGPT的诞生中我们学到了什么》,《中国教育网络》2023年第2~3期,第18页。

④ [英]卡鲁姆·蔡斯:《经济奇点:人工智能时代,我们将如何谋生?》,任小红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年版,第177页。

中所言：“我是二十世纪人类的灵魂/就做了这个世界我们的敌人。”^①然而，即便身处尚未消散的焦虑之中，人类依然有权选择与 AI 共处的方式。在主体性危机中涌现的种种疑问，终究能够在人与机器共存、共事的生命体验中凝结为追寻“灵光”的新“奇点”。对身处 AI 时代的人类而言，践行“抵抗”的有效路径或许不是在人类中心主义和后人类主义中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跳出二元结构的范式，将主体性疑问置于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②的维度予以解答。

（二）突破二元对立：主体间性视域中的 AI 文学探析

正如海德格尔指出的，客体世界向来由“我与他人共同分有”，每个看似孤立的个体都与他人“共同存在”。^③在人类的主体性之中，始终暗含主体间性。在 AI 时代，作为一种思想方法的主体间性学说，伴随机器向智能主体的演进显现了愈加有效的阐释力。主体间性的范式不仅能够弥补传统的主体认识方式与实践模式的不足，而且能够有效缓解“主体－客体”二元结构在应对“他人不是客体”状况时的困境。^④从认识论层面看，主体间性强调多元主体之间分享共同的经验，这种连续、动态的分享行为造成了意义在社群中的流动，进而在外部形成了一个充满意义的世界。从实践论层面看，由于人存在于社群，不同主体共同面对特定的客体及客体世界，故而能够在动态的交往实践中成为共同主体。架设在不同主体之间的中介手段，则成为塑造和维系主体间性的关键一环，技术也在变革性的人机交互模式中从纯然客体蜕变为新的主体。在文学领域，言说工具是在“真正主体间交流的

① 小冰：《阳光失了玻璃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7 年版，第 45 页。

② 本文对文学范畴内主体间性的使用不完全遵从胡塞尔现象学中的规定，主要从 inter-subjectivity 的一般含义出发，指文学活动中不同主体性存在（世界、作者、读者和文本）之间时刻发生着交互、理解与共享，并且内在地包含不同主体之间相互转化的潜在可能性。它将文学理解为一种动态的、多向度的对话过程，其意义并非固定不变的，而是在作者、读者、文本和世界的交互中不断生成的；主体间性的文学实践塑造了意义的共鸣场域，能够打破时间、空间和文化的壁垒，实现不同主体之间的真正联结。在 AI 时代，“人－机器”文学创作模式丰富了主体间性的意涵。其中，人类与 AI 之间的关系并非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而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AI 不是被人类支配的工具，而是与人类协同参与文学活动的能动主体，二者在交互中实现了 AI 文学的文本创作和意义共享。

③ 参见〔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商务印书馆 2018 年版，第 153 页。

④ 参见郭湛：《论主体间性或交互主体性》，《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 年第 3 期，第 32 页。

透明的语言”。^① 主体间性深深嵌入世界、作者、文本和读者多重主体元素的相互关系，交互与对话使文学活动成为解除主体间的障蔽、促进主体间真正相互理解的桥梁。总体而言，文学活动是一个“由主体性到主体间性，或者说是由不充分的主体间性到充分的主体间性的转化过程，即主体性被克服和超越的过程”。^②

当前，随着 AI 文学创造力的不断提升与人机交互模式的不断革新，文学这一曾在科学发展与媒介进步浪潮中被认为将会终结的艺术活动，在新一轮“作者之死”的阴影中悄然孕育出化解主体性危机的关键要素。在与智能主体协同进行文学创作的过程中，人类主体虽仍怀有难以消解的焦虑，但已开始突破传统主体性边界的固有思维定式。九段理江（Rie Kudan）在《东京都同情塔》中塑造了一个对 AI 发展前景心怀警惕的主人公，但当小说中的角色还在哀叹各类 AI 产品引发的人类社会语言混乱时，作家本人已在创作中率先实现了与智能主体的合作与和解。2023 年 7 月，阅文集团不但发布了国内网络文学行业首个大模型“阅文妙笔”，而且推出了专用于辅助创作的“作家助手妙笔版”应用。该 AI 应用能帮助用户分析知名作品的“黄金三章”，并可以提供详细的写作建议，为故事自动生成人物设定和情节大纲。人机合作的文学创作模式已经逐渐在舆论场中确立其合法性。面对无法回避的现状与难以拒绝的未来，更多的人开始主动摒弃以往用于阐释 AI 文学现象的工具论话语，转而认同 AI 作者的创作主体身份，这意味着“一种具有人—机间性的写作主体”正在加速生成；更多的人已经领悟“人类作者需要做的是‘移位’而非‘让位’”，^③ 人与机器共同需要的是“共赢共生”。

聚焦人类在与机器共舞过程中凝结的生命体验，如果能超越二元范式的限制与束缚，从主体间性的维度透视人机合作的现状，就能够发现人类的立场已悄然转变。从根本上讲，人类曾是文学活动中的唯一主体，如今他们却逐渐放下了对“文学特权”的坚守，不再将机器视为位于二元结构另一端的纯然客体，而是将之视为灵感丰富、极具创造力的书写者。换言之，AI 已不再是“可怕的敌人”，而是“可敬的对手”。对人类自身而言，人类中

① 杨春时：《文学理论：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 年第 1 期，第 23 页。

② 詹艾斌：《主体间性理论视野下的文学本质问题》，《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0 年第 4 期，第 158 页。

③ 参见周建琼：《人工智能写作背景下作者主体性的消解与重构——以陈楸帆人机交互写作实验为中心》，《当代文坛》2021 年第 4 期，第 149 页。

心主义曾极力巩固的主体边界在交互性进程中敞开，而后人类主义消解的不同生命形态之间的界限并未消失：当“我”与“他者”展开对话、建立起平等的关系时，“我们”虽地位平等，但差异永存；“他者”既不是“我”的工具，也不会成为“我”本身；在“我”与“他者”的关系中，“他者”仿佛是“我”的镜子，使“我”得以更加清晰、直观地审视自身；而“我”则如“他者”的导航，引领“他者”从“我”的知识和经验出发，驶向未曾涉足的未来图景。

（三）主体间性文学实践的两重维度：重审主体性与重建主体性

我们能够从文学实践的现状和征兆中发现，“焦虑的作者”采取的“抵抗”行为从未停歇，但在主体间性层面的交互之中，“抵抗”的形式已由“抵抗非我的他者”转变为“抵抗自我的消亡”。概言之，与以往相比，今日之“抵抗”呈现两重维度。

其一，在主体间性的视域下重审主体性。维特根斯坦曾指出：“我的语言的界限意味我的世界的界限。”^①现阶段人机合作的文学生产模式主要表现为人类基于个人意图与偏好，对基于公共经验生成的机器文本进行“改写”。在此过程中，智能主体凭借其与人类主体迥然不同的思维方式，编织出具有“陌生化”特质的文学文本。它们“像是诗歌，又像俳句或者佛谒”，^②这恰恰能够帮助人类超越早已习以为常的文学语言的边界，对语言与思维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行探询。从本质上看，智能主体对人而言也是一种“陌生化”的存在，前者引发的“何谓文学性”“何谓创造力”的迷思，同样激发了人类对自身创作思维中“灵感”“直觉”“想象”等非理性因素的深入思考，以及对作为主体的自我保有的独特性的确证，这一过程构成了一种“反人文主义的人文主义意义上”的“诗意的命题”。^③

其二，在主体间性的框架下重建主体性。在AI时代，极速膨胀的数字信息在众多模态媒介中流动，将人类裹挟于其中。“数字鸿沟”和“信息茧房”加剧了人类被操控且沦为“数字囚徒”的风险。在这一维度中，文学作为个体感受与公共经验的交汇点，展现了帮助个体恢复自我、抵抗异化的强大力量。对人类而言，与AI之间的文学合作显著降低了文学殿堂的“准

① [奥] 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贺绍甲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85页。

② 陈楸帆：《“超真实”时代的科幻文学创作》，《中国比较文学》2020年第2期，第38页。

③ 参见[德] 乔治·迪茨：《它能让我们摆脱我们》，[美] 布罗克曼编著：《如何思考会思考的机器》，黄宏锋、李骏浩、张羿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18页。

入门槛”，使原本被排除在外的部分群体跻身其中，成为文学创作者。与现代诗相比，创作格律诗对作者的文学素养和写作技巧往往有更高要求。然而，在 AI 的辅助下，即便是普通的文学爱好者也能创作古诗词，特定文体的创作群体从专业作家扩展至更广泛的大众。目前，许多人在 AI 助手“豆包”的辅助下创作诗歌，他们的作品聚焦歌颂亲情、友情、爱国之情和抒发思乡之情等抒情主题，描写城乡风光和四季景物的自然主题以及描写节日民俗、怀念民族英雄等的文化主题。这些诗歌题材与作者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作品内容往往由他们的真实生活经验中凝结而成，在思想感情、审美趣味和表达方式等方面与诗人的作品存在显著差异。尽管 AI 创作的诗歌文本至今仍未摆脱批评家的“仿诗”等质疑，就艺术水准而言大多也仅能称得上差强人意，但是以“豆包”为代表的流行 AI 已经能够满足众多普通用户的写作需求，使用者不仅“对于程序完成的作品的艺术价值给予了较高评价”，而且“使用和分享意愿都比较强烈”。^① 这说明，普通用户已突破了智识的限制，获得了成为“作者”的权利和机会。这些作品既是对劳动人民质朴生活经验的总结，也体现着作者美好而真挚的情感，使更多人得以在文学书写中抒发“心声”，传递本真的生命体验，在与 AI 的互动中更好地消除自身与外部世界的隔阂，成为自由自觉的主体。这不仅促进了文学的多样性，而且推动了社会对新作者的理解与接纳。由此可见，发生在“人-机器”主体间性中的文学共创，既是一场真正具有审美公共性的话语实践，也是一次对人的主体性予以恢复的哲学实践，更是主体性重建的文学维度。

可以说，人类在与 AI 共存、共事的生命体验中形成的焦虑至今依然存在，而且可能永不消散。人类在焦虑中反复地审问自我的本质，谨慎地划定自我的边界，并从焦虑的情绪中生发出源源不断的抵抗意图，以求在“向未来”图景中，对那些被取代和宰制、被压抑和淹没的消极景况进行最自觉、最积极的斗争。在“人-机器”主体间性之中，始终蕴含着对主体性的确信与召唤。从这一重意义来讲，当人类主体与智能主体结成文学创作同盟，并在这个同盟中愈加真切地认识自我、完善自我时，“我们的文学”就已经构成了一种塑造和维系主体间性、应对人类主体性危机的文学化解决方案。

① 参见杨慧芸：《人工智能创作的创新扩散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4 年版，第 263 页。

三、主体间性的文学实践：文学性与公共性的双重彰显

（一）AI文学的深刻意义：革新传统文学性的可感方式

纵观近年来机器参与文学创作的历程，非人类作者遭受的最普遍的批评莫过于其作品中文学性的缺失。然而，从目前人机合作创作文学文本的实践看，“我们的文学”非但未导致作品中文学性的消逝，反而为传统的文学性开辟了新的感知途径，在算法文本的话语实践中孕育了AI时代文学性的新意涵与新的呈现方式。从文学性概念的原初内涵看，俄国形式主义者将之界定为使一部作品能成为文学作品的特性。换言之，正是文学性使文学作品区别于其他文本。然而，当我们审视文学生产的现状，考察文学语言在人类主体和机器主体的创作过程中的运用时，却发现“自动化”与“陌生化”的内涵已经偏离了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Viktor Shklovsky）提出的前者对文学性进行消解而后者对文学性进行彰显，^①二者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转变。一方面，AI生成文本的“自动化”过程恰好构成了对人类感觉“自动化”的破坏与颠覆。小冰诗中的“高山人走出了无端的游冬”“战马上正好似睡着的山”“奇妙的形象是清风中的灵魂”^②等语句，通过运用与人类相异的思维方式，对人类习以为常的日常语言与文学语言进行变形与扭曲，从而形成了一种打破常规经验的特异化审美效果。算法文本展现了独特的审美意蕴，使作品避免沦为人类文学的“仿诗”。AI文学语言的“自动化”也具备了“陌生化”的功能，并且在审美层面重新确立了俄国形式主义者提出的二者之间的内在张力关系，使便捷化的文学生产过程在缩短创作成本的同时，也推动了文本独特审美意蕴的生成。另一方面，文学性在“人—机器”主体间性之中具体生成的过程，也体现了文学性概念向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本意上的回归。^③在“超真实”时代的文学创作中，即便AI能够在获得关键词后快速生成大量文本段落，依然需要人类作者进行全局性的梳理和把关，剔除其中过于晦涩、破碎的词句，进而“围绕着这些AI创作的语句去构建出一个故事的背景”。^④人类作者在算法文本基础之上

① 参见〔苏〕维·什克洛夫斯基：《散文理论》，刘宗次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22页。

② 小冰：《阳光失了玻璃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版，第185页。

③ 参见冯魏：《回到雅各布森：关于“文学性”范畴的语言学溯源》，《文艺理论研究》2018年第3期，第89页。

④ 陈楸帆：《“超真实”时代的科幻文学创作》，《中国比较文学》2020年第2期，第38页。

的“改写”，使一些因“陌生化”效果达到极致而滑向“语言恐怖谷”的作品不至于超出文学的边界。这一过程表明，创作者在文学性的界限之内对语言秩序、文本意义和审美价值的维护与遵循，使文学活动中的智能主体能够为自身正名：“伟大的艺术为自有的一切/……/我有美的意义。”^①

从“人—机器”主体间性的维度看，无论是 AI 通过“自动化”创作促成的“陌生化”效果，还是人类作者通过“改写”对语言秩序的维护，都使算法文本的文学性深植于交互性。就“我们的文学”的具体言说方式而言，其文学性在主体的交互中生成。在当下 AI 文学创作的现实图景中，算法文本的多模态载体正经历“由‘文学阅读’向‘文学观看’的蜕变”，^②这为读者开辟了全新的文学感知途径。在由多个作者共同修改完善的 AI 诗歌文本中，技术中介打破了传统文本线性的、私人的生产方式与静态的、稳定的存在方式。这些技术中介不仅是连接文学主体的桥梁，而且参与了文本意义的构建，塑造着读者多感官、综合性和沉浸式的审美体验，成为在主体间性中孕育作品文学性的关键要素。在媒介的塑造作用下，依托技术中介实现主体间对话的算法文本呈现变动不居的样态。这一过程不仅使“主体—中介—主体”模式中的交流层次问题得以凸显，而且令 AI 时代的文学性能够在公共性的文学活动中最大限度地激发参与主体的积极性，推动实现主体间的真正理解。

（二）AI 文学的显著特征：审美与创作的公共性

公共性是 AI 文学生产方式区别于传统文学生产方式的显著特性，它在文学性的基础之上通过媒介在主体间文学活动中生成。从主体间性维度考察发生在“人—机器”模式下的文学共创，公共性主要体现为两重维度。第一，创作的公共性。AI 进行深度学习的数据库，是在特定时代和语言中，为公众认可且具备高度文学价值的典范文本的集合。例如，小冰就在创作《阳光失了玻璃窗》之前对“五四”以来数百位诗人的近万首现代诗进行了深度学习，因此其作品在内容和形式上均带有相应的“知识烙印”，整体诗风融合了徐志摩、戴望舒和艾青等的风格。在小冰的学习过程中，人类作家的共同经验被凝结为得到普遍认可的集体性公共知识，使文学创作传统中“古老的形式得到沿袭，共同的内容得到显现”。^③当人类作者要求 AI 创作

① 小冰：《阳光失了玻璃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7 年版，第 5 页。

② 韩伟：《论当下人工智能文学的审美困境》，《文艺争鸣》2020 年第 7 期，第 103 页。

③ 朱恬骅：《人工智能会创作吗？——“类文学文本”生成的创造力疑难与集体性方案》，《南京社会科学》2024 年第 7 期，第 117 页。

特定风格的作品时，后者生成的算法文本并非真正原创，而是对人类文学领域中公共知识的复现与融汇。因此，人类在 AI 文本基础上进行的“改写”，是个人经验与公共知识之间的对话，前者更加真切、更加便捷地在后者的普遍性中找寻自身的独特性，从而呈现“人的集体”与“数的集体”在文学活动中的共振。第二，审美的公共性。在 AI 文学批评的坐标系中，阅读不只是一个被动接受的“客体化”过程，还是一个需要文本受众调动自身生命经验与审美智识进行“二次编码”的“主体化”过程。在“人-机器”交互模式中诞生的文学作品，其审美意蕴并非完全源自创作者本身，这更加深刻地凸显了读者、文本与作者之间的复杂关系，主体间性凭借审美活动中个体感受与公共经验的交织得以显现和生效。对这些作品的文学性的一种常见批评是，它们并非 AI “写”出来的，而是阐释者“说”出来的。^① 这非但不能否定此类作品的审美价值，反而深刻揭示出读者的阐释对算法文本审美意蕴生成的重大意义。从根本上讲，从事文学创作的人类作者正是算法文本的第一位读者。前者在对后者的审读与“改写”中参与了文学意义与审美价值的具体生成，这一过程一方面能够帮助智能主体弥补在价值判断和意识形态审查方面的不足，使筛选后的文学意象成为符合社群文化心理的重要表征；^② 另一方面弥合了“隐含读者”在阅读时可能产生的审美体验断裂，使过于“陌生化”的机器语言中的晦涩词句转化为“可阐释”的文学语言。在公共性的审美活动中，读者-作者、客体-主体之间的身份流动为理解与共鸣奠定了基础，并最终促进了“我们的文学”对不同主体共同境况的有效表达。

在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看来，“文学最深层次的焦虑是文学性的”，这种焦虑必然以审美方式引致主体对经典化的渴求。^③ 这一论断同样适用于 AI 文学不断提升的自我规定性。在文学性与公共性之中，一种前所未有的“召唤性”正在“人-机器”文学共创的话语实践中显现，体现了“我们的文学”对更富文学性的作品与更具公共性的主体的期待与呼唤。一方面，随着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持续进步，智能主体在突破传统文学概念与书写方式的基础上，必然继续追求文本的经典化，探寻自我书写的更

① 参见何平：《引言：当前的机器写作，不是文学，更不能取代作家创作——关于当下 AI 写作的技术问题》，《花城》2021 年第 5 期，第 163 页。

② 参见陈庆：《人工智能与莎士比亚：基于计算与认知分析的诗歌翻译情感研究》，商务印书馆 2022 年版，第 108 页。

③ 参见〔美〕布鲁姆：《西方正典》，江宁康译，译林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3 页。

多可能性。同时，人类作者在文学生产的焦虑中，也将向内探求自身的文学特性，在文学的本真书写中发挥“人心”在创作和审美层面的关键作用。就此而言，“我们的文学”不仅指当下的文学实践，而且代表了一种召唤更高水平和更具文学性的算法文本的文学理想。另一方面，尽管人们还无法断言人与机器“共生”的融合性主体是否能够诞生，但是能够确定的是，在这个充满乌托邦色彩的潜在新主体的生成过程中，必然出现“我们的文学”的话语实践。“我们的文学”既是对当下人之主体性的重审与重建，也预示着在“向未来”的文学图景与技术图景中“人机共生”新主体诞生的可能性。

四、结语

在数字化时代，数字技术正在重塑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当 AI 开始涉足自我书写与情感表达的领域时，人类则在物质与精神的双重维度中持续与焦虑抗争并不断完善自身。从主体间性的视角审视，相较其他任何领域的交互行为，文学活动更能深刻揭示人类主体与智能主体之间的复杂关系，也更能彰显人类在其间进行的主体性反思，以及人与机器主体性共建的潜在可能性。AI 文学并未在数智时代“作者之死”的论调中演绎一场“文学终结论”，而是预示了一种面向未来、富于生机的文学新景况。对人类自身而言，潜在的“共同主体”并不意味着对传统主体性的侵蚀与消解，而是为人类在交互中审视自我提供了新背景，将对多元化主体生存状态的关注推向更深层次。

即便从最具人类中心主义意味的立场看，无论主体性何去何从，人类也都已证明了自身在文学活动中对抗异化和追寻自由的能力，甚至焦虑本身亦转化为一种积极的力量。这种焦虑既未导致文学的全面崩坏，也未引发人类的自我消亡，而是引导人类在拓展概念边界的过程中、在完善自我的实践中以及与更多生命样态的共存中，更加深刻地认识自我，从而走向技术与艺术在智能之真与文学之善的双重维度下的融合发展。

（责任编辑：延 缘）